

## 第三章 隋唐时期

### 本章概要

隋唐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割据状态，重新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隋唐时期，我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这一时期“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在各民族、各地区已深入人心，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进一步巩固。隋朝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的范围。唐朝通过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治理西域，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治理体系，保障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唐朝军队支持下，回纥起兵反抗东突厥汗国，并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回鹘西迁后，融合了西域许多部落，与汉人等共同建设开发了新疆地区。隋唐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入，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精神气质。

### 第一节 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开创

#### 一、隋唐的兴衰

581 年，杨坚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杨坚就是隋文帝。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国力兴盛，开始营建东都、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加强了南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隋炀帝后期，统治日益暴虐，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起义军的打击下，隋朝的统治面临瓦解。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镇守太原的隋朝官僚李渊起兵反隋。618 年，隋炀帝被叛军杀死，李渊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随后，唐朝消灭了各支起义军和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626 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如流，在位期间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版图扩大，人口增多，生活安宁，史称“贞观之治”。武则天统治期间，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口继续增长，边疆得到巩固和开拓。712 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唐玄宗执政前期，年号“开元”，当时国库充盈，军事强大，民众生活安定，四夷宾服，史称“开元盛世”，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顶峰；执政后期，因放纵享乐，忽视国事，最终爆发“安史之乱”，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907 年，唐朝灭亡。

#### 二、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世界影响力

隋朝建立后，朝野上下积极主张大一统，希望实现“天下大同，四夷内附”。隋文帝以完成一统为己任，希望“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认为“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这一思想对推动隋朝统一全国具有重要意义。唐朝对周边各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在他看来，“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因此必须“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当东突厥汗国被唐朝灭亡、南蛮冯氏家族献地归唐后，唐太宗大宴群臣，慷慨而言：“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此后，唐朝统治者都奉行“大一统”和“天下一家”的理念，这一理念也成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成为各族人民共同遵奉的政治理念。

隋唐时期的管辖范围较之秦汉更加辽阔。隋朝虽然短促，但其疆域极盛时，东起辽河，北抵大漠，西至新疆东部，南据越南北部。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并分别设立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对边疆地区进行管辖。

隋唐时期的治理体系更加成熟。隋朝统一后，加强中央集权，确立三省六部制，地方上实行州（郡）县两级制；隋朝发展经济，编订户籍，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统一南北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唐初改进并发展了隋朝的各种制度。朝廷设“三省六部”，既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地方设州、县两级，重要地区设有都督，兼理军事与民政，继续实行府兵制和科举制，以儒家经典和诗赋选拔人才。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大一统格局的巩固。

大唐盛世，在当时的世界上声名显赫，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唐朝以开放胸怀和包容精神，广泛吸纳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时代风貌。当时的都城长安是一座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国际性大都会，许多国家的使节、商人、学者、僧侣云集这里，使长安成为各种文化展示和融合的舞台。朝鲜、日本、印度等国派许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其中日本派出的遣唐使有十几批，最多的一次有 500 多人。据记载，大明宫曾宴请过 70 多个国家的宾客，彰显了唐朝开放的精神。

前来隋唐的使者和留学生等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优秀

文明成果。比如，日本派遣的使节等人员，把唐朝先进的制度、天文、历法、文字、典籍、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等传回日本，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真亲自参与修筑的唐招提寺，气势雄伟，结构精巧，成为日本佛寺建筑的典范。又如，新罗（今朝鲜半岛）依照唐制设立国学，教授《周易》《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氏传》《文选》，儒家经典成为新罗学生的必读书。

隋唐时期，造纸技术传播至日本、朝鲜和中亚的一些国家，并通过贸易传播到了印度、叙利亚、埃及以及欧洲，火药也传到了欧洲。这些科技成果举世闻名，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

## 第二节 隋唐对新疆地区的治理

### 一、隋唐统一西域

隋朝初期，西域主要处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突厥的控制之下。突厥人在当地征收沉重赋税，毁坏城邑，俘掠奴仆，致使一些城市荒芜，几乎没有人烟，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隋朝统一中原后，即面临着进一步统一漠北和西域的形势。隋炀帝即位后，派裴矩到河西走廊了解西域情况。裴矩据此编写了《西域图记》，记述了西域各城郭自西汉到隋朝期间的历史演变，描述了西域的山川河流，记录了各地的民俗风土。608年，隋炀帝联络铁勒诸部，打败了甘肃、青海一带的吐谷浑，设立了4个郡，其中鄯善郡和且末郡在今新疆境内。同年，隋朝夺取伊吾，兴建了“新伊吾城”，成为隋朝控制东西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军事据点。610年，隋朝正式设立伊吾郡，重启了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门户。鄯善郡、且末郡和伊吾郡的设置，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施行的范围。

唐朝建立后，西域诸城郭纷纷派使者来到长安，表明归属唐朝的意愿。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开始了统一西域的进程。630年，唐朝联合漠北回纥等部消灭了东突厥汗国，解除了来自北部的威胁。漠北各部相继归附，他们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并在大漠南北开辟了“参天可汗大道”，直通内地，沿途驿站星罗棋布，成为同中原密切联系的纽带。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原属西突厥的伊吾城主率所属七城自愿归顺唐朝，唐朝置西伊州（后改称伊州），高昌、焉耆、龟兹、疏勒等纷纷效之，这些都为唐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640年，唐朝平定麴氏高昌，设立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并设立安西都护府于西州。647年，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攻下焉耆、龟兹等地，收其降部。657年，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叛乱，在天山以北及中亚地区设立了都护府和州，统归安西大都护府管辖。至此，唐朝完全统一西域。658年，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 二、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

唐朝时期，中央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在力量布局、管辖治理等方面较前代更为完善，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管理体系。

布局要地。新疆地区地处东西方交通要道，北接强大的游牧部落，南邻青藏

高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朝在治理力量的布局上与前朝相比，除了通过在新疆地区东部设置伊州、西州、庭州牢牢控制中原通往新疆地区的战略要道外，更重视经略新疆地区西部和南部的沿边要地。唐朝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在龟兹、焉耆（后以碎叶镇代焉耆）、于阗、疏勒四城修筑城堡，建置军镇，即“安西四镇”。“安西四镇”治所以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疏勒为龙头，由安西都护兼统，驻守新疆地区西部、南部沿边要地，特别是碎叶镇（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更是深入西部，濒临中亚。“安西四镇”的建立，大大扩展了唐王朝直接治理西域的范围，对维护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安全、维护唐朝政治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都护统领。唐朝统一西域后，分别于 640 年和 702 年设安西、北庭两个都护府，后升级为安西、北庭大都护府，分管天山南北地区。都护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官有定员，职有专任。大都护下设副大都护、副都护。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共计 20 个都督府；北庭都护府统辖范围包括天山以北、楚河以西至里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共计 23 个都督府。

因俗而治。唐朝在汉族民众较集中的新疆东部地区，实行州、县两级行政管理制度，推行均田制度和租庸调制度等，这些州、县与中原等地区实行相同的制度，贯彻执行中央的政令。唐朝在伊州、西州、庭州以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推行府州制，按部落或地区大小，列置府、州、县，任命当地的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等官职。这些民族首领作为唐朝命官，享受国家固定俸禄，肩负朝廷使命。这些府、州、县不用向朝廷缴纳赋税，但在行政、军事上必须服从中央指令，必须承担为国守土、遣兵助战的义务，这对加强边防实力，巩固唐朝对西域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

屯田戍边。唐朝沿袭历代中央政权屯田戍边的传统，继续在西域实施屯田。贞观年间，唐太宗曾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缗帛为军资，有屯田以资糗粮，牧使以挽羊马”，开始实施在西北地区的屯田。此后，唐朝在西域的屯田规模进一步扩大，并设有专职“支度营田使”管理屯田事务。据统计，当时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治所等地屯田共计 56 屯，以每屯 50 顷计算，屯田达 2800 顷。唐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推动了西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维护了西域的政治稳定。

保障交通。唐朝天山南北交通以安西大都护府治所龟兹和北庭大都护府治所庭州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在东起庭州、西至碎叶的广大范围内，设立了众多的驿馆、烽燧，以确保东西通道安全畅通和往来商旅、使者的食宿；商客和使节经过西域，需持有中央或地方颁发的“过所”，说明外出原因、人数、身份等，审核后方可通行。这些措施使西域由汉代以来单纯的军事防御地区变为相对稳定的区域，西北地区“荡然以清”，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 三、新疆地区及周边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认同

隋唐对西域较为完善的治理，确保了中央政令的顺利实施，促进了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增强了西域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认同。

当时，突厥汗国等地方政权都具有浓厚的大一统意识。585年，东突厥汗国沙钵略可汗请求迁徙至漠南（今内蒙古）归附隋朝，得到同意。沙钵略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sǎng），永为藩附。”隋文帝下诏宣布：“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并下令祭祀天地祖宗，向天下宣告这件大事。次年，隋朝又向突厥颁发历法，表明自己是突厥正统合法的统治者。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隋朝后期。隋朝册立的启民可汗曾亲自到长安迎亲，住在长安的太常寺，专门学习中原传统的婚丧礼仪。隋朝先后把宗室女安义、义成公主嫁给他。启民可汗也曾提出“愿率部落变改衣服，一如华夏”的主张。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突厥登里可汗在接受唐玄宗册封时表示：“奴身曾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每征发为国出力……伏愿天可汗寿命延长，天下一统。”突厥登里可汗明确提出“天下一统”的观念具有深远意义，体现出“大一统”思想得到少数民族的广泛认同。

隋唐时期，许多西域少数民族将领保卫国家、守卫边疆，出生入死，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安史之乱爆发后，于阗王尉迟胜忧虑国家安危，亲率五千于阗子弟，不远万里，入关平叛。后来，又有一些其他首领来朝，请求“助国讨贼”，被派到朔方行营效力。吐蕃控制西域期间，西域守军与内地的联系断绝，但仍然奉唐正朔，保卫西域免受战乱之祸。848年，张义潮揭竿而起，一呼百应，推翻吐蕃统治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入唐，“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这是西北各民族不忘故土的明证。

### 第三节 突厥消亡、回鹘西迁及民族构成的新变化

#### 一、突厥解体与回鹘西迁

突厥是6世纪中叶兴起于阿尔泰山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552年消灭了柔然汗国后，建立起了疆域辽阔的突厥汗国。583年，突厥汗国以阿尔泰山为界分裂为东西两大势力。东突厥活动于漠北草原，西突厥游牧于准噶尔盆地和中亚锡尔河以北的哈萨克草原东部。隋末，西突厥首领统叶护可汗即位后“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西突厥占据西域后，阻塞商路，掠夺商旅，阻断了唐朝中央政权与西域的联系。在此形势下，唐太宗进兵西域，多次击败西突厥势力，原来役属于西突厥的西域诸城郭纷纷归附唐朝。648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率部降唐，唐朝任命他为瑶池都督，管治西突厥诸部。649年，唐太宗去世，阿史那贺鲁趁机反叛。651年，3万唐军联合5万回纥骑兵征讨阿史那贺鲁。657年，唐军大获全胜，生擒阿史那贺鲁，灭西突厥汗国，完全统一了西域。682年，安置在北方的东突厥部众在臣服唐朝50年后反叛，一度建立了后突厥汗国。744年，唐朝与漠北回纥、葛逻禄等联手平定了后突厥汗国。突厥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也随着汗国的消亡于8世纪中后期解体，并在西迁中亚西亚过程中与当地部族长期融合，形成多个新的民族，新的民族与古突厥民族有本质区别。从此，突厥在我国北方退出历史舞台。

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民族融合形成的。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是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活动在蒙古高原，曾经有乌护、乌纥、袁纥、韦纥等多种译名。回纥最初比较弱小，受突厥人的奴役和统治。为了反抗突厥的压迫和奴役，回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等部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在唐朝军队支持下，回纥起兵反抗东突厥汗国，并先后攻灭西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744年，统一了回纥各部的首领骨力裴罗因功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了回纥汗国，立牙帐于乌德鞬山（于都斤山，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控地“东极室韦，西金山，南控大漠”。回纥每一任可汗都要经过中央册封承认。安史之乱爆发后，回纥两次出兵助唐，与唐朝关系十分密切。788年，回纥统治者上书唐朝，自请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833年，唐文宗册封回鹘可汗时，明确提出“海内四极，惟唐旧封；天下一家，与我同轨”。唐朝把回鹘视同一家，不分彼此。

9 世纪 30 年代后，漠北回鹘汗国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逐渐走向衰亡。839 年，漠发生瘟疫，又连遭大雪。840 年，回鹘汗国被黠戛斯攻破，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内地同汉人融合外，其余分三支：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支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逻禄、样磨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喇汗王朝。迁往西域的回鹘人又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等，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

隋唐时期，新疆地区的汉人主要是在当地军政机构任职的官员、驻扎各地的士兵、从事屯垦的军民、往来贸易的商人，以及僧侣等，他们分布在天山南北，伊、西、庭三州尤为集中。唐朝的屯田区域，“安西二十屯，疏（疏）勒七屯，焉耆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一屯，天山一屯”。这些屯田区，都有大量的汉人士兵和平民。长寿元年（692），唐将王孝杰等打败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僧人慧超约在开元十五年（727）到达龟兹时看到这里的“汉僧行大乘法”，“有两所汉僧住持，行大乘法”，其中的“龙兴寺主，名法海，虽是汉儿生安西，学识人风，不殊华夏”，说明这一时期的西域，也有许多汉人僧侣。

这一时期，还有其他民族在新疆地区活动。吐蕃于 6 世纪末兴起于雅鲁藏布江流域，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了天山南北部分地域。9 世纪中叶，吐蕃势力退出西域。隋唐时期，随着丝路贸易的繁荣，天山南北都出现了大量的粟特聚落。后来，在我国境内的粟特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

## 二、唐朝与回纥等民族的亲密关系

控制西域的突厥等势力对西域诸民族进行残酷奴役，被压迫民族不断反抗，积极寻求唐朝庇护，客观上加速了唐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步伐。唐朝统一后，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诸民族间进行了更为广泛的交往融合，中华民族大家庭再一次得到了发展壮大。

突厥对西域诸民族残酷压迫，激起了强烈反抗。史载突厥“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605 年，西突厥处罗可汗进攻铁勒诸部，重税其财物，又猜忌薛延陀部等，遂召集铁勒诸部的首领数百人“悉坑之”。

回纥与唐朝关系十分密切，主要表现为唐朝对历任回纥可汗的册封、回纥助



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朝的和亲，以及唐朝与回纥之间的绢马互市。

唐朝对历任回纥可汗的册封。册封是唐朝与回纥之间保持臣属关系的重要标志之一。回纥新任可汗地位的合法性与否以及能否得到所在部众的承认，取决于是否得到了唐朝的册封。

唐朝册封回纥可汗的封号均有一定的含义，主要是表彰回纥对唐朝的忠诚与对双方友好关系的贡献。如回纥汗国第二任可汗磨延啜曾助唐讨伐安史叛军，收复西京长安，从而将回纥与唐朝的友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因此被唐肃宗册封为“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唐朝对其册文称：“夫定祸乱者曰武，建功名者曰义，惟武与义，是为明德。”每当回纥可汗去世后，唐朝也都会派遣册封使、吊祭使，如第九任保义可汗去世后，唐朝派人吊祭，在祭文中称保义可汗“代为新邻，多入贡职。方赖威略，共清寰瀛，依为长城，永固中夏”。唐代文献记录了许多回纥可汗去世后新任可汗派人赴长安“来告丧”的情况。如回纥第五任可汗忠贞可汗于贞元六年（790）去世，其子阿啜继立为汗，立即遣使“告忠贞可汗之哀于我，且请册新君”，唐德宗乃派人册立阿啜为奉诚可汗。即使在回鹘汗国灭亡后，其残部仍沿旧例，遣使于唐，请求册封。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四散。庞特勤率众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大中年间（847—859），“庞勒（即庞特勤）已自称可汗，有碛西诸城”。大中十年十月，唐宣宗“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于是唐宣宗派王端章为册封使者，册封庞特勤为怀建可汗。唐宣宗在册封的诏书中回顾了唐朝与回纥的亲密关系，回鹘可汗“在天宝时，叶护有功于京、洛。乾元（758—760）至德（756—758），与子仪（指郭子仪）叶心，大破西虏。自尔以降，谊为舅甥，岁有通和，情无诡诈”。虽然庞特勤已自称可汗，但唐廷仍“尚恐未为诸蕃所信，犹疑新造之邦”，因而“特命使臣，遵行册礼”，并且要“须布中外，咸使闻知，表朕中怀，不问夷夏”。

回纥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一度攻占长安、洛阳。756年，回纥葛勒可汗派长子叶护亲自率军南下平叛，在今陕西凤翔、扶风一带与前来迎接的唐肃宗长子广平王会合。广平王准备宴请叶护，叶护说：“国家有难，远来相助，何暇食为？”安史之乱平定后，唐肃宗感动地说：“万里绝域，一德同心，求之古今，所未闻也。”757年，唐朝军队在回纥军的支持下，收复京城长安。762年，唐代宗新继位，而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仍占据洛阳继续发动叛乱，于是唐

代宗派人再次向回纥登里可汗借兵平叛。针对史朝义叛军“乞师并力，欲灭唐社”的活动，登里可汗“忿彼孤恩，窃弄神器。亲总骁雄，与王师犄角，合势齐驱，剋复京洛。

回纥与唐朝和亲。回纥与唐朝双方有嫁有娶，互为姻亲。回纥公主嫁与唐朝，唐朝则以皇帝之女或皇妹嫁与回纥，双方建立了甥舅关系。757年，唐肃宗继位，派遣宗室成员敦煌郡王李承案等人“使于回纥，以修好征兵。及至其牙，（葛勒）可汗以女嫁于承案，遣首领来朝，请和亲，封回纥公主为毗伽公主”。不久，又“纳回纥公主为妃”。唐朝先后有4位公主嫁与回纥可汗。758年，唐肃宗以亲生幼女宁国公主嫁葛勒可汗，“将成万里之婚，冀定四方之业”。758年，唐肃宗又将自己的族妹、唐玄宗的孙女嫁与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磨延啜（葛勒可汗）、英义建功可汗移地健，“回纥号为小宁国公主，历配英武、英义二可汗”。小宁国公主在回纥生活了33年（758—791）。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回纥武义成功可汗顿莫贺遣使“来贡方物，且请和亲”，唐德宗于次年（788）以其第八女咸安公主嫁与回纥可汗。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0年（788—808），先后嫁与4位回纥可汗为妻。她死后，唐朝特命著名诗人白居易撰写了《祭咸安公主文》，表彰她“及礼从出降，义重和亲；承渥泽于三朝，播芳猷于九姓。远修好信，既申协比之姻；殊俗保和，实赖肃雍之德”，对她的去世深表哀悼。自咸安公主去世后，回纥“屡归款请继前好”，唐穆宗即位后，于长庆二年（822）“封第十妹为太和公主”嫁与回纥崇德可汗。太和公主在回纥汗国经历了最为动荡的时代，回纥汗国灭亡后，太和公主才于843年辗转回到中原，前后在回纥汗国生活了21年。在唐朝给回鹘的赐书中，甥舅的称谓也成为定制：“回鹘天睦可汗书，头云皇帝舅敬问回鹘天睦可汗外甥，尾云想宜知悉，时候卿比平安好，将相及部族男女兼存问之。下同前使印。如册可汗，即首云敕某王子外甥，尾云问部族男女等。”，回纥与唐朝这种亲密的甥舅关系影响深远，此后，回鹘与唐朝“代为甥舅，每岁通和”，直到宋代，仍然保持着甥舅关系。回纥与唐朝的和亲，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绢马互市。唐代中后期，养马业出现衰微，由于无力供给军需马匹，唐廷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议率朝臣马以助军”。鉴于此，唐朝开始从回纥等游牧民族中购买马匹，而回纥也经常以大批马匹来换取唐朝的丝绢和茶叶，双方绢马互市贸易日益兴盛。“回纥自乾元（758—760）以来，岁求和市，每一马易四十缣，

动至数万匹。”唐朝时期，中原地区饮茶之风日益盛行，“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受此影响，饮茶也成为回纥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回纥人常以马匹换取唐朝的茶叶，“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唐朝与回纥的绢马互市、茶马贸易，极大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商业贸易在促进回纥草原城镇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各民族与中原地区各民族间交往更加密切。东突厥灭亡后，有降众 10 万户被朝廷安置于河套以南，其部落首领迁入京师居住生活的有数千家，突厥贵族被任命为将军、中郎将等五品以上官者达百余人；西突厥灭亡后，先后有几批西突厥部众降唐后被徙入中原地区，这些人与当地居民交往交流，逐渐融入汉人之中。西域诸城郭首领也有留居长安等地而汉化者。如于阗国王尉迟胜天宝年间入唐，尚宗室女，后返国，安史之乱后，留京宿卫。疏勒王族裴汾武德来朝，“遂籍京兆”，后逐渐汉化。天宝年间驻守河陇的名将哥舒翰，原为西突厥突骑施部，“世居安西”，后亦汉化。唐开元、天宝年间，往来于高昌、沙州（今甘肃敦煌）、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肃州（今甘肃酒泉）及京师长安等地的胡商为数众多。他们有的定居于上述诸城，娶妻生子，渐染华风；也有不少以乐舞伎、画工等业谋生的西域胡人留居长安、洛阳等地，以后逐渐融入汉人。

各少数民族相互融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疏勒国，其王姓裴氏。贞观中，突厥以女妻王。”贞观十四年，“西突厥重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女，由是相为唇齿”。而高昌国“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此外，突厥、吐蕃掠夺大量的中原人，这些人也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吐蕃溃散后，逐渐与当地的党项、羌族融合。

隋唐延续了魏晋时期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新疆地区民族格局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各民族共同创造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

## 第四节 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加深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农业方面，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大一统使隋唐时期的商业比前代规模更大，丝绸之路的繁荣使隋唐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新疆地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繁荣发展，商贾云集，呈现出勃勃生机。

### 一、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的推行

均田制是唐朝前期一项重要的土地制度，均田制在中原地区实行的同时，还推行于边陲。从吐鲁番文书所见新疆地区均田制的实施，不仅佐证了唐代均田制在新疆地区的实施，也说明了新疆地区在唐代与中原地区经济制度的一致性。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颁布均田令，推行均田制。从吐鲁番阿斯塔那 78 号墓所出文书《唐贞观十四年西州高昌县李石住等户手实》看，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平定高昌，并以其地设置西州。同年九月，唐朝即在西州普遍实行了户口和土地的调查，所有人户均需申报手实（即户籍）。户籍人口管理制度是唐朝社会经济制度的支柱，唐代的赋税完全依赖于其对人口的控制。唐在西州实行户籍人口管理，为进一步推行均田制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也充分反映了唐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管理。

唐朝的均田制是将部分国家控制的土地根据人口的多寡分给无地的农民耕种，向他们征收赋税。唐太宗曾派人到西州，宣布将当地的官有土地分配给旧官吏、乡绅和百姓，这可能是唐在西州实行均田制的开始。吐鲁番阿斯塔那 152 号墓出土的《唐残手实》第一段记载：“五亩已受”“合应受田叁拾伍”“卅亩未受”。哈拉和卓 39 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年间西州高昌县手实二》中也有“应授田陆拾壹亩”的记载。

通过均田制，唐朝把广大农民束缚于土地上，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巩固唐朝的封建统治。与此同时，通过实施均田制，新疆地区的许多荒地得到了开垦，耕地面积扩大了，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迅速提高，为唐朝以后新疆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租庸调制作为与均田制相适应的唐朝赋税制度，随着均田制在新疆地区的施行，一并推广到了这一地区。在吐鲁番出土的户籍残卷上，我们常常见到姓名、年龄之下注有“小男”“小女”“丁寡”“课户”“不课户”“见输”“不

见输”等字样。这表明，唐代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在新疆地区得到了执行。哈拉和卓1号墓中发现过一件《唐仓曹地子麦粟帐》残件，有“（仓）曹地子麦粟壹佰贰拾捌硕”的记载，“地子”就是地租，或称田租。从文书内容看，唐代在西州地区所征收的实物地租有麦、粟、枣等。

唐代这一重要的赋税制度在天山南北的西州、伊州、庭州等地区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行。尤其是西州，作为唐在新疆地区设置的与中原地区相同的重要府州，租庸调制这一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在这里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贯彻实施。租庸调制的实施，使广大农民为了完成赋税徭役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推动了新疆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西北边疆，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 二、经济发达、商贾云集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程度空前加强，特别是唐统一西域后，中原经济、文化对新疆广大地区形成强烈辐射。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的诗句“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无疑是当时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经济交流繁荣景象的写照。

西突厥控制西域时期，与唐朝的经济往来主要通过绢马互市。绢马互市不仅推动了新疆地区传统畜牧业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传统游牧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安西、北庭都设有市集，每次交易的马匹数量都在百匹乃至千匹以上。吐鲁番地区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批骆驼、马、牛、羊以及驼夫、马夫的彩色泥塑，生动反映了新疆地区畜牧业的兴盛。《旧唐书·突厥传》中记载，杜暹任安西都护时，突骑施金河公主“遣牙官赍马千匹诣安西互市。”回鹘西迁后，与当地民众相互交流学习，不仅继承发展了新疆地区的葡萄种植业等，也逐渐从畜牧业为主转变为农业生产为主，生活方式也从游牧逐渐转变为定居。

入唐后，随着汉人大批定居天山南北，中原地区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作物的传入，使新疆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长足发展。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高昌回鹘时期的铁铧较汉代犁铧更加轻便实用。唐朝规定“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高昌延寿元年（624）张寺主赁羊尿粪刺薪券》记载了在西州地区种植作物已开始精心施肥，缺肥时甚至卖粮以购进肥料的情形。

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建完善和用水的有效管理，极大地促进了新疆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早在高昌郡、高昌国时期，新疆地区就已形成了完善的水渠网络，建

立了严格的用水与分配制度，并设专职人员以司其事。740 年，高昌县为修浚新兴谷、草泽堤堰和箭杆渠等水利设施，将所需民工数上报西州请求依例处理，需要动用的民工有“群牧、庄坞、匠店及夷胡户”等近 1500 人次。考古资料证明，隋唐时期新疆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小麦、青稞、燕麦、稻米、粳米、粟、糜黍等品种齐全，尤以小麦为主粮。汉人大批西渡流沙后，韭菜、葱、茱萸、蔓菁、白菜等作物从中原地区传入新疆地区。

这一时期，在手工业方面，新疆地区有铁、铜、钢、金、银等金属的开采、冶炼和加工，能制造日用器皿、生产工具和银钱铜币等。纺织手工业中的丝纺、棉纺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州的棉织品——白（dié）布成为重要贡品之一；龟兹拨换城的毛纺织品东销内地，西售中亚，十分畅销。西州还出现了“纸坊”，不仅碛西二府的公文用纸完全可以自给自足，还生产有涂料纸及以加淀粉技术制成的彩画用纸、染色纸等。

唐代新疆地区商业活动非常活跃。西州的商业区不仅出现了从事专业经营的“行”，还有活跃于中原地区与新疆及中亚等地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行客”。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并大量举钱、举练、放贷等。西州地处交通枢纽，不仅是边陲重镇、西北区域性市场，也是中外各种物资的集散中心、胡汉商贾汇聚之地。和西州一山之隔的庭州、轮台，这时商贸市场也很繁荣，有些从中原来的汉人，从事贩运数年间成为巨富，资财数千万。《新唐书》记载，裴旻先经商“五年至数千万。娶降胡女为妻，妻有黄金、骏马、牛羊，以财自雄”。中亚各地商人特别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纷至沓来，于此地留下他们的活动踪迹。

货币流通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新变化。628 年，玄奘西行时，高昌主要使用银币，间或有少量金币和铜钱，焉耆“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龟兹也同样“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这里所说的小铜钱，指龟兹自铸的各种铜钱。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库车等地隋唐遗址内发现的龟兹文铜钱有万枚以上，说明在当地流通领域内，自铸的铜钱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随着唐朝统一西域，中原与边地经贸关系密切。在各绿洲城镇，唐朝的法定铜币开元通宝越来越多。7 世纪上半叶高昌等地，商品贸易中各种金属货币并用，以银钱为主。在各种文书里，银钱通常称“文”，铜钱往往称“个”，如《延寿十四年（637）四月参军海相等五人入辛卯岁钱条记》：“辛卯岁钱壹文，铜钱十四个。”《高昌卫寺明藏等纳钱帐》中，除银钱贰文外，分别有铜钱贰个、肆个、

伍个的记载。7 世纪下半叶，西州等地进入两种货币并用的转换时期，武周如意元年（692）《里正李黑收领史玄政长行马价抄》中，有“付 长行马价貳文，准铜钱陆拾肆文”，此正为银钱通行衰竭的表现。武周以后，银 钱便逐渐从文书中消失。进入 8 世纪，一般的钱则指铜钱，并称为“文”了。如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唐课钱帐历》有“百文付药直”，《唐质库帐历》有“尹娘正月十八日取伍拾文”，都是指铜钱。大谷文书中的《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更能说明 8 世纪在吐鲁番地区市场价格均以铜钱计算的事实。在交河的市场，不仅买卖丝绸、香料、牲畜要用铜钱的文数来表示价格，禾草和粪肥在商行里出售，也同样以“文”计价，说明城乡居民都和市场交易发生了密切联系，而铜钱的流通也就较前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处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于阗也同样如此。

### 三、丝绸之路的空前繁盛

唐朝的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甘肃河西走廊，在新疆地区分为北道（天山以北）、中道（塔里木盆地北缘）、南道（塔里木盆地南缘），至中亚及欧洲等地区。丝绸之路北道的兴盛，推动了庭州、弓月（今新疆霍城县一带）、轮台、碎叶、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等新兴城镇和贸易中心的涌现。

入唐后，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天山北部草原路的畅通使新疆地区与毗邻地区的商贸交往活动更加便捷。唐朝为维护交通和商道安全，在沿途设置了大量驿站、驿馆等设施，过往行人和客商经过时要有官府颁发的过所方能通行。这些设施和规定既便利了军政官员和军队的往来交通，也给过往商旅和物资流通带来极大方便。640 年，唐朝平定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可汗浮图城为庭州，从此，“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中亚商贾络绎东来，中原商客亦相继西去。丝绸之路将唐朝都城长安和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网。来往于中原、新疆地区的商人、使者、僧侣等经由这条贯穿亚欧的通道，将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典籍等运往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和欧洲，同时将新疆地区，以及中亚和欧洲等地的珍宝、特产和宗教、文化书籍等传到中原地区。丝绸之路上呈现出“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

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当时，长安城内最为繁华的西市，汇聚

了 220 多个行业，有酒肆、衣行、药店、古器、珠宝、铁铺等。这里有来自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其中以中亚与波斯、大食的胡商最多。李白曾赋诗云：“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不少胡人在此购地安宅，从此定居下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

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其科技文化成就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唐朝军人及工匠，将中国造纸、丝织、金银制作等技术传播到阿拉伯及西方各地。唐朝后期，中国制造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随着炼丹术传入阿拉伯，被当地人称为“中国雪”，后被用于医学、炼丹、烧制玻璃和琉璃。

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为推动唐朝走向繁荣兴盛作出了巨大贡献。

## 第五节 盛唐气象中的新疆地区文化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文化先进自信，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给各民族提供了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通过汇聚南北内外，融合创新，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汉字、儒学、律令、汉传佛教、科学技术等构成了这个文化圈的共同文化因子和要素。中华文明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中原等地区文化对新疆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 一、中原文化在新疆地区的广泛传播

唐朝时期，中原文化呈现出融合、统一、开放的形态和特征，有容乃大，光被四表，空前繁荣，对新疆地区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强。

中原制度文化继续沿袭。唐在西州设立军政管理系统，下辖五县二十四乡。西州长官为刺史，负责考核官吏，劝保农桑，兼民事、司法权于一身。州下设有上佐、参军以及六曹等行政部门。州、县、乡、里等制度的建立，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唐代，于阗王入唐后深受中原制度文化的影响。如尉迟胜等王名，天寿三年等年号，牛年六月十日等纪年法，包括官方文书都是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兼用的。

汉语的学习使用日渐普遍。隋唐统一西域后，汉语言成为官方通用语，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各种官私文书和墓表，交河沟西墓地所出土的墓表，几乎都是用



汉文书写而成的，表明当时高昌官方和民间普遍使用汉文字。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唐人学习汉字、写诗的残页和启蒙读物。阿斯塔那 263 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710）西州学童卜天寿文书，作者年方十二，不仅手抄了《论语》，自己还创作了一些诗歌，比如“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酖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说明当时新疆地区与中原同样设有私塾，学习同样的经典，书写同样的汉字。唐玄宗时代的边塞诗人岑参的诗歌“叶河蕃王能汉语”，生动反映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使用汉语的情况。

儒家文化思想进一步根植。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中发现大量《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论语》《孝经》《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等，其中以《诗经》《尚书》发现最多。当时高昌地区开办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仅乡学学员就数以千计，启蒙课本为《千字文》《开蒙要训》等。从这一地区发现的唐经学注解《正义》和《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说明伊州、西州、庭州等地的学子可以参加朝廷科举取士。

书法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兰亭序》是被称为“书圣”的东晋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人称“天下行书第一”，是后人研习临摹书法的范本。今新疆和田地区先后出土过 3 件《兰亭序》抄本。从残缺的抄本中可以看到“永和于会稽山阴群贤毕至山峻”描摹字样，说明唐代中原书法艺术在当地非常流行。

中原医学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了许多汉文医药学理论、本草、医方、针灸、医事、兽医等不同类型的文书残卷，表明隋唐时期中原医学在新疆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撰《千金方》是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其中收录的“西州续命汤”药方一方面吸收了古代高昌地区人们与疾病抗争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作了适当的调整，反映出中原与新疆地区在医药领域的互学互鉴。

中原服饰文化在新疆地区成为时尚。隋唐时期，新疆地区服饰明显受到汉装的影响。库木吐拉石窟第 12 窟所绘的菩萨，头梳高髻，余发垂肩，戴宝冠，两耳饰珰，锦巾斜披，肩披轻纱，穿红罗裙，腰裹绿巾，大带双垂，形同中原妇女的服饰。高昌国时期，男子是胡服发辫，女子则保持汉装髻发。进入唐代，一律削衽解辫，男女都髻发右衽，女性的发式、服装更追逐两京（长安、洛阳）时尚，甚至在吐蕃统治西域时期亦长盛不衰。

丧葬习俗仿效中原。西州的汉人家族观念强，大都同族聚居，死后共葬一个墓群。夫妻多为合葬，以供子孙祭拜。当地的丧葬习俗完全按照儒家丧礼制度，严格遵循《仪礼》中有关丧葬的规定，死者头枕鸡鸣枕，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双手握木，身着棉麻或绢锦。祭祀时用书写“黄金百斤”“绢百匹”等纸质祭品，每逢元旦，各个家族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由此可见，西州的丧葬习俗体现了中原地区入土为安的人伦情感，更是对儒家孝道伦理主体地位的积极维系。

中国古代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人类的始祖，创造了万物。汉代中原各地都刻画伏羲女娲图作为墓室和宗族祠堂中的供奉物。在新疆的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魏晋南北朝后期至隋唐的伏羲女娲图。一些图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汉人的形象，另外一些图将伏羲女娲描绘为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汉胡两种风格同时出现，说明新疆各族伏羲女娲图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左为汉风，右为胡风，说明新疆地区各族先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刻统一。也更加说明新疆与祖国内地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 二、新疆地区与中原文化的互鉴融通

隋唐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交流深入发展。新疆地区运往中原的牲畜、毛织品、玉石、香料、药材等商品更加丰富，中原输往新疆地区的丝绸、铁器、漆器、茶叶也源源不断。新疆地区的音乐舞蹈流行于中原，进一步充实了我国的文化艺术宝库。

边塞诗歌以新疆风物为意象。盛唐时期是边塞诗创作的高峰。天山、楼兰、大漠、长河、烽火、狼烟、杨柳、葡萄、马、羌笛、胡雁、鹰、夕阳、长城等构成了边塞诗鲜明的意象和符号，边塞诗代表人物有岑参、王昌龄、高适等。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有“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形象地描写了新疆深秋之际狂风怒吼、飞雪飘舞的壮丽景色。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道：“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李颀的《听安万善吹觱篥歌》写道：“南山截竹为觱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唐玄宗时期曾任北庭都护的盖嘉运进献的《伊州》曲中写道：“长安二月柳依依，西出流沙路渐微。阐（yān）氏山上春光少，相府庭边驿使稀。”这些诗句都充分展示了新疆地区的地理、人文风貌。

佛经翻译吸收借鉴。唐代，在佛教文化传播和翻译过程中，出现了玄奘、王玄策、悟空这样的文化使者，其中玄奘不畏艰险，西行数万里到达印度取经，埋头苦读十七载，遍及大小乘各种学说，还带回佛舍利 150 粒、佛像 7 尊、经论 657 部，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 75 部、1335 卷。其中玄奘主要翻译了《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经典。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佛学经典的翻译和汉传佛教在新疆地区的传布，促进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发展。

新疆地区佛教文化的多元滋养。寺院、石窟林立，犍陀罗艺术、中亚佛教艺术、本地特色艺术交融齐飞。在佛教文学方面，以诗歌、戏剧等文学形式编写的本生佛传故事得以繁荣。在音乐舞蹈方面，行像浴佛、节庆法会与日常祭祀仪式中的娱神音乐、舞蹈、乐器和编排多彩多姿，既有印度佛曲创作元素，也有新疆地区的音乐风格。龟兹出土了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文献，包括《六牙象本生故事》《画家的传说》《国王的故事》等。龟兹佛教文化主要以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和库车的库木吐拉石窟最具代表性。库木吐拉石窟在建筑、壁画风格题材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龟兹佛教文化在建筑、雕塑、舞蹈、戏剧、音乐、文学包括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等方面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以中亚佛教艺术为基础的绘画艺术趋于成熟，形成了以石窟、壁画、佛像等为主的新疆地区佛教建筑特色，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

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艺术交相辉映。丝绸艺术大放光彩。到了隋唐，中国丝绸艺术融汇东西，精彩纷呈，具有华丽、饱满的特色，呈现出雍容大度、兼容并包、浓墨重彩的气度，堪称“大唐之花”。纬锦的出现带来提花技术的重要变革。北方丝绸较多接受了来自域外及北方部族的影响，而南方则更多继承了汉文化特色，追求清秀飘逸之美。艺术风格上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又从中亚、西亚的装饰艺术中汲取营养，具有新疆地区风格的联珠纹样大量出现在中原丝绸织物上。织锦类型由汉魏的平纹经锦到唐代的斜纹经锦，图案题材从早期的动物纹样转向动植物纹样并重，动物纹样则从兽类纹样转向以飞禽类纹样为主，这在艺术史上是一次重大转折。

音乐舞蹈优势互补。隋唐“燕乐”是盛大宴会上由优秀艺人演出的乐舞，隋朝初期宫廷设置了《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等七部燕乐。后又增加《康国伎》和《疏勒伎》，并将《国

伎》改名为《西凉伎》。唐朝建立后，继续沿用隋朝的“九部乐”，乐制舞制依旧。后来废除《文康伎》，又增加了《燕乐》《高昌伎》，并把歌颂唐朝兴盛的《燕乐》列为首部。除《燕乐》《清商伎》两部外，其余八部都是兄弟民族及外国乐舞。高昌乐在唐代被宫廷定为“十部乐”之一，所使用的乐器大多传自西域。龟兹乐居宫廷“十部乐”中的四夷乐之首。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龟兹为“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羌笛、曲项琵琶、唢呐等这些当时在西域流行的乐器与中原乐器融为一体，逐渐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唐舞打破了汉代以来舞蹈杂技同台并存的局面，成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形式，其舞种之多样，舞姿之新颖，气魄之宏伟，饮誉海内外，形成燕乐舞蹈的高峰。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经西域传来。胡旋舞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蹬踏，故名胡旋。胡旋女身着宽摆长裙，头戴饰品，旋舞时长袖起伏，如飘雪飞絮。《乐府杂录》描述：胡旋舞在“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毯子上”。《新唐书·礼乐志》也这样描绘：“胡旋舞，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白居易在《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诗句生动描绘了胡旋女的长袖善舞。于阗乐、高昌乐、龟兹乐、胡旋舞等西域乐舞深入宫廷，长安城一时流行西域风，出现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和“洛阳家家学胡乐”的盛景。音乐舞蹈的吸收互补、交流交融，丰富了中华艺术的宝库。

绘画艺术互通互学。隋唐绘画艺术吸收西域“晕染法”，在各类题材上都有发展。唐太宗贞观六年（632），于阗画家尉迟乙僧被于阗王推荐给唐太宗，从于阗来到长安。他在长安专门为寺院创作壁画，深受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喜爱。于阗画派在用笔方面，以“曹衣出水”“屈铁盘丝”的线描手法独树一帜，与中原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吴道子的“兰叶描”三足鼎立，形成中国画造型用线的经典范式之一。

中原地区与西域习俗相互影响。唐代长安出现了以“酒胡”命名的劝人饮酒之具。它是用木头刻的胡人相貌的木人，下端为锥形，使用时置于盘中旋转，木人倒下时所指向者当饮酒。同时，中原等地也使用被称为“金叵罗”的酒杯，这在岑参的“交河美酒金叵罗”诗句中也有反映。西域酒俗文化也影响着唐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一批记载美酒的诗词。如唐代王翰的《凉州词》这样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形象地描述了将士们出发前正准备痛饮，却

在琵琶的催促声中奔赴战场的场景。

隋唐时期，新疆地区文化呈现出多元、包容、开放、繁荣的景象，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愈加明显。在“大一统”思想的浸润下，中华文化更加博大精深、开放包容，也有力促进了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新疆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对中华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 第六节 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演变

隋唐时期，佛教进一步走向兴盛，开始结成中国佛教宗派，道教也因李唐皇室的尊崇而兴。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陆续传入中国。这一时期，道教依然在新疆地区发展，汉传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新疆地区，以佛教为主、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巩固，各种宗教交流并存。

### 一、佛教、景教、摩尼教

隋唐时期，佛教在新疆地区继续传播，但各地的情况已发生了不少的变化。于阗佛教出现了盛极而衰的景象。《大唐西域记》中所记“伽蓝百有余所，僧徒五千余人”，与法显时（公元4世纪）所记僧徒数万，家家门前皆起小塔的盛况相比，已非昨日。疏勒，唐初佛教也正处于鼎盛时期，但到727年慧超至疏勒时，看到这里只是“有寺有僧，行小乘法”而已，可见疏勒佛教至唐中期开始，已出现衰落迹象。隋唐时，龟兹佛教仍保持了兴旺，“每岁秋分数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渴日忘疲”。从玄奘上述所记龟兹国行像的盛景，到慧超所记龟兹国“足寺足僧”，说明龟兹佛教仍方兴未艾。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佛教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中原汉地佛教回传新疆地区的现象。大批汉僧携汉译佛经从中原来到新疆地区习修禅定，汉传佛教盛于三州、四镇。由于汉文佛经的传入和大量汉人佛僧的进入，新疆地区出现不少以汉语诵读佛经的现象。北庭、高昌、龟兹等地设立了汉文佛典的译场。新疆地区与中原佛教文化的交流也达到高潮，僧人往来十分频繁。西行求法的玄奘，游历新疆多地，讲经论法，拜师会友，宣扬大乘教法，之后翻译了大量佛教典籍。疏勒国裴氏王族后代慧琳来到长安西明寺，他“内持密藏，外究儒流，印度声明，支那诂训，靡不精奥”。他还参照《字林》《字统》《声类》《三苍》《切

韵》《玉篇》，以及“诸经杂史，参合佛意，详察是非”，撰写成《一切经音义》，在佛经翻译、古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有突出贡献。

唐朝统一西域后，新疆地区流行的外来宗教除佛教外，还有景教、摩尼教和祆教等。景教也称聂斯脱利派，5 世纪产生于东罗马，是基督教中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教派。景教大约在 6 世纪传入新疆地区，主要是在民间流传，信奉者多为粟特人、叙利亚人、波斯人，还有回鹘人。后经新疆等地传入中原地区。“景”字含有“光明广大”之意，源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句。今高昌故城遗址中发现有景教壁画，吐鲁番附近也发现了粟特文景教经典残片，说明景教在吐鲁番地区流行过。

摩尼教于 3 世纪中叶由摩尼（216—276）创立于波斯，是继祆教后传入新疆地区的又一古代波斯宗教。因崇尚光明，又称“明教”。约 6 世纪末 7 世纪初，摩尼教传入新疆，但当时影响不大。694 年前后，摩尼教传入洛阳。漠北回鹘汗国时期，摩尼教在回鹘人中得到很大发展。840 年，回鹘西迁后，进一步推动了摩尼教在高昌等地的发展，建立了摩尼教寺院和教团组织。在吐鲁番曾发现了大量摩尼教寺院遗址和众多文物。西迁的回鹘人改信佛教后，新疆的摩尼教逐渐衰落。

唐朝对祆教非常重视，设置了管理祆教的机构，名为“萨薄府”或“萨宝府”，将祆教神职人员纳入唐朝官制体系。在疏勒，祆教一度盛于佛教。同时，祆教在伊州、西州、庭州也很流行，唐朝在这些地方设置萨宝进行管理，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即有“萨薄”的记载。《新唐书》记于阗“喜事祆神，浮屠法”，说明祆教在此地也有传播。

## 二、多种宗教在新疆地区的并存与融合

这一时期，新疆地区各种宗教并行不悖，融洽相处，共同发展。高昌地区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道教等不同宗教的信徒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摩尼教随着回鹘西迁，在高昌繁盛一时。

摩尼教本身就很善于吸收其他宗教的思想，在其创立之时，就已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主张。摩尼教传播到新疆地区后，也保持了这一特点。译自汉文的回鹘文佛经《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在翻译时就出现将汉文本中的阴阳学说改译成符合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二元论教理的现象，其用意在于借助佛教来弘扬摩尼教的教义。

唐朝统治者对道教的尊崇，也促进了道教在新疆地区的发展。据敦煌藏本唐光启元年（885）《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在伊吾县有祥麟（móu）观、大罗观，柔远县有天上观等。在西州有一座佛塔，传说该塔是古代印度阿育王所造，因为道家称得道之人为圣人，当地人受道教思想的影响，故将该塔称为圣人塔。这反映了佛教与道教的相互吸收借鉴。在吐鲁番的唐墓中，曾出土道教符箓、道教残经卷以及一大批死者衣物疏。在这些出土的文书中，有一件 621 年的《张头子随葬衣物疏》文书，其书写格式是道教符箓常用的格式，但使用这种符的死者却都是佛教信仰者。这种符箓与普通道教符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内容中既有包括“五道（大神）”“急急如律令”等道教神名、道教用语，也有佛教“佛弟子”“五戒”等佛教用语。道教与佛教用语同存共见、交互夹杂的现象，反映了新疆道教与佛教相融合的情况。